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面向*

张一飞

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界定、具体表现与发生原理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实力、科技与全球化三大方向。本文以世界范围、百年时长、质变现象、全新事物为边界，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定义为“全世界范围内，在至少过去百年的时间长度中所未见的质变现象”，并从激情、理性和欲望的深度分别论述了全球性故事弱化、战争乏力可图、智能迅速崛起三种“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的根本原理在于人类正处于从物质主义时期向后物质主义时期的过渡时期，而后物质主义时期的图景尚未清晰，致使人类在新生变局中陷入各种两难境地。本文还为中国在大变局中提出了广泛承认他国独特性，专注解决国内后物质主义问题，尽快投入未来伦理与法律问题研究三种自处之道。

关键词：大变局 全球性故事 战争 智能 后物质主义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在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多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在国内外迅速形成共识。^[1]此次世界性变局不仅以中国复兴、新兴经济体集体性崛

张一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Email: zhangyifei@cass.org.cn。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老师的指导，当然文责自负。

[1]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参考网，2019年5月23日，<http://www.fx361.com/page/2019/0523/5141905.shtml>[2019-12-01]。

起为显著特征，更以世界范围内出现人类前所未有的思想交互和生产方式重组为核心内容。要深刻洞悉“大变局”，便不能只论表面“变化”而忽视根本“大局”。如何从世界的广度和未来的深度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表现在哪些方面？大变局出现的原因为何？中国应如何在大变局中合理自处？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容边界及其解析

仅从字面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条件一，从空间来看，“大变局”必须以世界为发生范围。习总书记所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人类关怀，而非仅仅关乎中国一地，或某些大国。早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名臣李鸿章便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描述清朝所处之境况，但其视野格局仅仅覆盖大清一国，而其言所出之时，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世界根本性变局早已发生百年以上。因此，不能将李鸿章之“变局”套用于当下之变局。条件二，从时间来看，“大变局”必须是至少过去百年时长内所未见的现象。换言之，从近年来向前回顾百年至一战结束前后，其间发生的重大现象不能作为“大变局”所涵内容，否则即非“百年未有”。条件三，“大变局”是质变而非量变。所谓“大”者，基本格局、根本形态也。尽管某些现象从百年前即开始萌芽演进，但其漫长演进过程为过去百年所能见，在其出现质变之前是“变化”而非“变局”，更不能称之为“大”。条件四，“大变局”无关长期稳定存在的事物或事态。“恰似达尔文对生物构造所做的概括性评论：‘自然界富于变化却吝于革新’”。^[1]自有人类伊始便已存在的现象及其必然具备的阶段性“生老病死”循环都不能被视为“大变局”的题中之义。

因此，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应拘泥于表面现象或超出上述边界的解读。许多专家学者在此边界内外进行了殊为有益的探索，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有学者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体性物质实力崛起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李文从经济方面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

[1][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中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持续走强，使西方世界在经济上丧失绝对优势……亚洲，尤其是东亚取代欧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1]阮宗泽从国际实力格局对比的角度对最近百年历史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冷战更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而当下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促使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均衡化。^[2]任晶晶主要强调了中国的实力崛起，他认为，“中国始终保有高度能动性，在融入发展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驾驭了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中国经济具有庞大的规模和体量，这一方面决定了发达国家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依赖，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具备了经济反制能力”。^[3]

但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否已经在“质变”意义上改变了冷战之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是否满足前文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第三个条件。如果不满足，则仍属趋势性“变化”而非根本性“变局”。如果中国仍将长期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并未成为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新超级大国”；而各新兴经济体也并未取代传统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地缘军事、新兴科技与国际话语权的中心力量，那么，对于国际格局所处的演变阶段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联系则有待更细致的研究。

其次，有学者将高科技的发展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金灿荣从历史发展延续的角度指出，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原子电子化革命之后，以人工智能、3D打印、5G、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向人类走来。^[4]李拓进一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概括为两个阶段，即电子和自动化阶段，以及信息化与智能化阶段。他尤其强调了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人类带来重大发展机遇。^[5]

[1] 李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构成与应对”，《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3期，第26~27页。

[2] 阮宗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大特点前所未有”，《世界知识》，2018年第24期，第14页。

[3] 任晶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3期，第20~21页。

[4] 金灿荣：“观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五个视角”，《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3期，第15页。

[5] 李拓：“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内涵”，《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年第3期，第45页。

赵磊更强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时代”的分布特征。他认为，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代表了一种从技术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1]

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确为共识，但是，高新科技进步的不同方向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联系似乎强弱有别，似乎并非所有的科技进步内容都满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第二个条件。科技进步有效率进步的一面，也有智能进步的一面。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是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题，并非过去百年所未见。因此，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无论其将生产和生活效率推进至何等神乎其神之状，都不能被视为人类进步尺度上的根本革新。“科技进步”这一现象中只有超出“提升效率”的“人外智能”部分才真正属于过去百年未见之质变。

最后，有学者将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权衡指出“近20年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得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尽管他也观察到“逆全球化”的出现，但是他相信“因为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阶段，全球合作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重要特征和内在规律，因此试图阻止全球化发展，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都是不可能、也行不通的做法”。^[2]王俊生和秦升认为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达到百年未有之紧密，“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气候变化、文明冲突、全球治理、贸易规则、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单独应对”。^[3]蔡拓则主要辨析了“逆全球化”的非理性，他认为“逆全球化”片面地把全球理解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甚至把全球化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将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简单地理解为自由主义。这些“全球化过时论”与“全球化死亡论”都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误解。^[4]

[1]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16页。

[2] 权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机理与中国之战略应对”，《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3期，第11~12页。

[3] 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红旗文稿》，2019年第7期，第14页。

[4] 蔡拓：“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全球大变局的症结与应对”，《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第7页。

但是，从历史的长度来看，使各国际行为体紧密连接的全球化进程是否满足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条件二和条件三，似乎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自西方国家开始大航海运动之后五百年，全球化进程始终在向前推进，实为过去五百年所已见。另一方面，虽然全球化的正面进程达到了历史未有之高度，但并没有使全球发生“融为一体”的质变，主权仍然横亘于“人类”这一共有身份之前，短期内无法逾越。因此，就全球化进程而论，“变化”则有，“变局”似无。

一言以蔽之，上述三类现象皆有“百年已有，未逢质变”之嫌，但它们却有助于加深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容边界的理解。据此观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描述的应是“全世界范围内，在至少过去百年的时间长度中所未见的质变现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面向

柏拉图将人的灵魂分为激情、理性与欲望三个部分。^[1]其中，激情对应被他者承认的需求，理性对应生存需求，欲望对应快乐需求。事实上，国家作为人的集合，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根源也无出其外。如果人类追求激情、运行理性、满足欲望的实践没有发生质变，则很难通过表面现象论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降临。因此，大变局的内容应从国家行为的需求根源加以观察和认知，并对其未来演变方向保持开放态度。

（一）激情饥渴：在最难以合作时最需要合作

人类是“故事”而非“逻辑”的动物。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从神话开始，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本质上都是基于其想象的秩序“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和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2]故事的核心要素不是逻辑自洽，亦非可以证伪，而是故事信仰者互为主体，正如货币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它携带价值。鉴于人类的不同族群以不同的故事凝聚，人类追求激情满足的过程，也是人类以各种方式寻求他者相信本族群故事的过程。最佳的故事即是被最多人接受的故事，因

[1][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8~179页。

[2][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27页。

此，最佳故事不可能长篇累牍或晦涩难解，而只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便于传播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因果叙事。

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个在一定时期内最具竞争力的故事：德国故事、苏联故事和美国故事。^[1]德国故事最为简单：因为本族群自认具有统治一切的资格，所以德国必须用本族群的剑为本族群的犁获得土地。这种与全世界为敌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实践失败，与其故事相似的盟友也一败涂地。1945年之后，德国故事消失，世界进入美苏“故事争霸”时代。两者相比之下，苏联故事更为简洁：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先进力量，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虽然故事美好，但苏联却因其政治经济体制僵化与多次战略决策失误逐渐丧失了实践故事的现实基础。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本相信苏联故事的族群纷纷改弦更张，至1991年底，苏联本国也已对自我身份不再坚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故事似乎获得了一家独大的地位：因为民主政体与自由经济最为科学，所以如果人类所有族群全部复制此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则人类整体将获得安全与繁荣。^[2]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故事之弊亦凸显于世，各国不仅震惊于美国及本国的经济损失，更震惊于自由主义故事的失真。“这场危机意味着，美国官方全力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弊端、不平衡，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都难辞其咎”。^[3]美英作为自由主义故事的开创者和领衔者不仅未能对其顽疾予以治愈，更未能就故事运行失灵向全世界做出合理说明。因此，即使仍然依赖自由主义路径的国家也不得不开始思考新的激情满足渠道。但迄今为止，尚且没有一个大国提出具有苏联或美国故事影响力的新故事，可供大范围信奉。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故事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有效，其对国际权力、制度、文化的长期塑造使其他国家的路径依赖红利甚大，无形中延长了美国故事的功能惯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尚且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如苏联和美国一般的全球性现实成功，遂无一国超越美苏当年的全球影响力。中国故事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潜在选项，它已将故事的因果关系编辑完成，即“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现实主题与最高目标，所以人类应

[1]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21st Century*, Canad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2018, p.1.

[2] [法]托克维尔著，江尚清译：《论美国的民主》，红旗出版社，2017年，第589-591页。

[3] 刘帅帅：“2007年金融危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衰落”，《中国集体经济》，2016年第21期，第21页。

该尽量祛除一切有碍于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尚需通过更巨大的现实成功证明这一故事的可行性，更需超强实力为其故事护航。至少在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前，中国犹需对其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加以更深的探索和阐释。因此，在美国故事开始崩坏之后，世界开始滑向“0故事”时代。

然而，世界向“0故事”状态滑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曾经出现过世界故事碎片化的情况，即使如冷战中的苏联和美国，也只是在较大的范围内提供了相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故事，人类从未进入过“某一故事彻底一统天下”的状态。在故事弱化的背景下，人类面对的百年未有之真正难题在于“在合作难度最大的时刻，必须进行最深程度的合作”。一方面，由于缺少大范围内的权威故事，国家陷入群体性激情饥渴，各主权国家，甚至主权国家内各族群开始本能回归本集体的独特故事寻求激情归宿，各国“承认”和“被承认”的难度都大幅上升。尤其是西方大国已经开始向“去故事化”的功利主义路线回归，无政府性被进一步加深。美英不再热衷于故事供给，反而从较高的意义需求纷纷回归较低的生存需求，“黑暗森林”的阴云再次于国际关系的地平线浮现。而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又空前严重，“从科学家的专业陈述来看，全球资源匮乏、生态危机、气候问题、能源危机、自然灾害、工业污染等问题，已经到了非经全球合作治理无以解决的地步”，^[1]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上述危机。可以说，人类相互依赖的程度早已发生“不合作即灭亡”的质变，合作必要性之高远超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冷战中的任何一个时期。换言之，在故事相对一致的情况下，人类基于自我执着的激情可以通过故事疏导，而后在较低的激情状态下比较顺利地开展理性合作；而在故事相对碎片化的情况下，各族群激情被堵塞于内部，无处释放，大量精力被用于对抗内部情绪，而非用于对外合作。遗憾的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日益上升的合作需求不会因人类本身的激情堵塞而消减，“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更多地出现了交叉渗透与重叠”，^[2]单纯的“某国问题”或单纯的“权力政治问题”将越发罕见。人类已经陷入了“0故事”时代的合作难题——主观上的自我执着和客观上放下

[1] 任剑涛：“全球危机、生活风格与人类自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12页。

[2] 刘真晔：“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思想渊源与现实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41页。

自我执着的必要性双双空前巨大。单纯的群体性激情饥渴，或者单纯的合作必要性达到质变高度都不足以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两者“互不兼容却同步登顶”的局面确为百年未有之大难题。

（二）理性升级：战争从此乏利可图

关于战争的起源所论甚繁，不可否认，战争具有“非利益”的一面，因为“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1]但是，人们之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看到强国入侵而弱国防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农耕民族防御，是因为战争发动者必然存在功利主义考量——弱国入侵强国乃以卵击石，农耕民族入侵游牧民族虽胜犹败（因为无法获得可耕种土地）。“战争是否有利可图”至少和“战争是否能满足征服的快感”同等重要。根据约翰·米尔斯海默的传世之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统计，在过去150年中，主导大国都选择了扩张，并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因战争而获益。^[2]尽管个别大国在近期因过度战争而崩溃，但放在更长的时间轴来看，与崩溃前获得的巨大利益相比，偶尔发生的崩溃是否足以证明“战争无利”犹难定论。抛开战争的道德立场不谈，从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的时代开始，经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西征，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对于强大的一方而言，战争在绝大部分时间确系一本万利的政治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彼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为物质型增长，强大一方通过战争占领的土地、财产、人口、自然资源不仅可以补偿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军费，还可获得更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机会。以甲午中日战争为例，日本不仅通过战争获得清朝割地与巨额赔款，更重要的是，日本借此机遇建立起了本国成熟的教育体系和金融体系，并且获得了在清朝内陆直接设厂的权利，随即一举跻身大国之列。

然而，战争的有利性在核武器出现之后开始模糊。理论上讲，在两个相互确保摧毁的国家之间，核战争的唯一后果，即具有二次打击能力的双方在无限战争中同归于尽，毕竟“某个特定界限必须能够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有限条件的连续统一体；否则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能否与自己承认同一个界限”，^[3]战争后果的确定性使战争过程更多地集中于隔空心理较量。比如，在冷战中，“苏联的战略家

[1][英]约翰·基根著，林华译：《战争史》，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3页。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

[3][美]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们明白核战争会导致极端的毁灭。但是他们决心要限制对苏联的破坏并在任何一次超级大国间的核交易中获得胜利”。^[1]但是，即便国家对于核战争结果的预期如此悲观，对于核武器作用的定位如此精确，仍然无法确认战争是否绝对无利可图，这主要是因为实践经验不足。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被原子弹攻击以外，再无第二个国家受此攻击。尤其是相互确保摧毁的国家之间从未爆发真正落地的核战争，所有核战争推演皆在理论层面进行，而理论和现实永远存在差距。在真正发生核战争之前，没有人可以对复杂系统中的每一个参数的变化了如指掌。核威慑的意义仅仅存在于舆论层面，某个气势汹汹、自称睚眦必报的有核国家在真正受到核打击的一刹那，其深明大义、理性自觉的一面也许会立刻占据上风——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永远无法预先体会发生情境之中的感受。而一旦该国放弃核还击，从此必将威慑失灵，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发动核战争者在实践中存在有利可图的概率。因此，尽管核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规则与战争伦理，但它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有利性，则无从检验。核武器对于大国和平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分项，却远远不是决定项。

然而，当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几乎可以确认战争沦为一种乏利可图的政治行为，原因在于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质变。“在过去，物质财富主要依托于自然资源。因此，征服可以带来直接收益。如果你在战场上征服了你的敌人，你可以任意抢劫对方的城市，在奴隶市场上将对方的人民贩卖为奴，占领粮食产地和金矿……但是今天，物质财富主要依托于科技知识和组织机制，而非农田、金矿或者油井，你不可能通过战争获得知识”。^[2]因此，战争红利已经微乎其微，比如，美军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不仅没有为本国带来经济收益，反而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将本国置于“不得不日耗千金而滞留”或者“牺牲尊严而撤退”的窘境。即使一个核大国启动战略魄力迫使另一个核大国屈服，它也许可以顶住巨大的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要求对方进行有限的、算术级数、较于战争和占领成本微乎其微的割地、赔款，但却无法从战争中得到能够呈几何级数刺激经济增长的思维方式、组织智慧与核心技术，因为这些要素并非物质，且被征服者的这些要素在大概率上相较征服者为劣。

[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页。

[2]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21st Century*, Canad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2018, pp.179~180.

作为主导人类历史数千年的主要交流方式之一，战争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然沦为一种在多数情况下仅为虚张声势的游戏，甚至其威慑效力也日渐衰减，如此“大变局”正是经济增长方式倒逼人类理性升级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战争乏利可图”不等于“人类不会进行战争”，正如前文强调，战争的起源存在非利益因素。目前的理性升级只对具有理性受体的国家或者国家领导人有效，只能从意愿而无法从能力上根除战争。正如尤瓦尔所警告的那样：“永远不应低估人类的愚蠢。”^[1]

（三）欲望越界：当工具产生意识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不仅在进化中和其他动物一样与物分离，而且进一步与动物相分离。“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2]主动的、自觉的人和被动的、他觉的物差异甚为明显；进而在有感生命中，“就拥有生命活动而言，人与动物是相同的，区别是在于人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并不直接同一，所以人不像动物那样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在人那里，人自身与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前者拿后者当对象看。这一‘看’，即是‘意识’，或‘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3]换言之，人即“自觉”，而后，方有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等一系列素质产生。

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提高生产和生活效率是其唯一主题，机器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无论是使人类颇显渺小的百万吨级运载工具，或者一次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本身都没有令人类感到惊慌。一群人类恐惧的对象仍然仅限于这些事物背后的“另一群人类”，因为只有“另一群人类”才会使用这些破坏性力量。但是近年来，人类更丰富的欲望需要更高级的工具用更快的速度实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科技工具第一次有可能打破人类的“直觉”垄断。此论并非断言机器已经具有“自觉”，图灵测试认为只要机器能够与具有自觉性的人自由交流并不被发现，即可判定机器具有意识；^[4]但是塞尔的中文屋实验则又证明机器与人交流根本不需要自主意识，甚至不需要理解交

[1]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21st Century*, Canad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 2018, p. 182.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7页。

[3] 王德峰：“马克思意识概念和生产概念的存在论探源——兼论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批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24页。

[4] A. K. Dewdney, “Turing Tes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66, No.1, Jan. 1992, p.30.

流内容，亦可实现。^[1]此非本文重点，不加深究。重点在于，机器在客观上已经可以实现主动性、计划性和灵活性等非自觉性不可实现的现实效果。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除了需要人类给予“第一推动力”，机器可以在生产和生活中处理所有余下环节，且不需人类参与和指导。机器“主观”上是否真的“自觉”是一回事，客观上是否实现了“自觉”才能实现的现实效果是另一回事。机器是否真的具有（或者在人类给予“第一推动力”之后具有）“自觉”，在哲学层面或许十分重要，但人类数百年来形成的效率至上心理使其重要性在实践层面相形见绌，人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已经可以切实感受到另一种智能的存在，机器的“自觉性”效果已经可以应用于生产、生活，甚至艺术，这是更加直接的革命性冲击。“工具产生意识”所引发的变局或是千年尺度上的大事，但真正使全人类（而非个别发达国家或个别学术精英）开始认真考虑“脑外是否有脑”的变局确为近年发生，百年所未见。

机器产生“自觉”的客观效果（未必是“自觉”的“主观”现实）只是某种大变局之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潜在的智能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类社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涌入人外智能因素，导致社会发展超负荷加速，而人类的伦理、法律、文化、心理等软件准备无法同速率匹配。即使仅仅发展到目前的程度，“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之下，人们感到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也感到遭遇的困境越来越多；在剧烈的竞争之下，人类感到自身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但遭受的压迫越来越重；在追求终极幸福的努力中，人们只争朝夕，追星赶月，却越来越感到整个社会正在向末日疾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人们越来越慢，但幸福感却越来越低”。^[2]对此窘境放任自流，则未来必将更甚。第二，由于人类无力在纯知识层面与机器竞争，最终有可能将知识全部“外包”，以至“反主为客”而不自知。随着知识更新速率越来越快，基于生物性能的人类大脑与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机器智能相比，差距也将越来越大。知识更新速率推演至极致，必将出现“知识甫一出现随即过时”的境况，这种知识的“方生方死”更加有利于情感零滞后的机器而非人类学习。因此，基于市场分工的效率追求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学习和分析任务从人类转移至机器，但数据和深度学习的配合是否存在意识质变的临界点犹未可知，即使不存在这一意识临界点，其配合也必将大大深化

[1] Gordon G. Globus, “Destructing the Chinese Room”, *The Journal of Mind and Behavior*, Vol.12, No.3, Summer 1991, pp. 378~380.

[2] 鲁楠：“科技革命与法律演化的两个面相”，《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1期，第78页。

机器“自觉”的客观效果。人类在人机围棋游戏中的失利并不仅仅意味着机器学习能力更强，也意味着人类可能在未来某天被机器改造为“桶中之脑”而不自知。第三，人类外延能力的增长将刺激人类产生有可能损害人类生存基本盘的空前欲望。欲望是文明发展的第一动力，但也有可能是文明毁灭的第一杀手。主导人类四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就是不顾需求多少，无限扩展欲望边界的思维方式。资本主义精神辅以超强技术手段的前景很有可能是人类将所有技术层面的“可行性”转化为欲望层面的“必要性”。届时人类不仅有可能将传统的生存级别危机，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推向极端境地，更有可能在科技与欲望的恶性循环支配下产生盲目自信，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比如，人类进一步探索太空的行为可能导致更高级文明发现地球，进而对地球进行殖民或摧毁。第四，在“虚拟世界现实化，现实世界虚拟化”的科技背景下，人类可能发生“异化”，沦为另一种机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人类越来越像机器”。以机器的深度学习技术为例，“由于人文资源本身的再生是以大量的人类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深度学习机制对于人类劳动力的大量取代，将在根本上对人类社会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1]

更为堪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已经塑造出了以科技进步为正义的人类集体人格。尽管理性从未停止警告人类：“限制效率”，至少“限制人外智能”是更为稳妥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以欲望支配的主流文化中，没有人乐于做一个科技领域的“保守党人”，“增长的信条绝对会坚决反对这种异端想法，反而认为我们应该加快脚步”。^[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原因

不难发现，激情饥渴、理性升级、欲望越界三种大变局的发生使国家处于进退两难、左支右绌的艰辛境地：一方面各国回归自我身份，国际合作难度在最有必要合作之时达到最大；但另一方面战争却又入不敷出，不再是解决冲突的首选。一方面人类直觉上认为有必要限制智能科技的发展速度，合作解决可以预见

[1] 徐英瑾：“试论深度学习技术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风险”，《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1期，第10页。

[2] [以]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93页。

的智能危机；但另一方面人类一旦放慢脚步，停滞危机就会立刻到来。换言之，合作甚难，战争甚难，停下甚难，发展甚难，总之一切甚难。如此艰险之局何以发生？

首先，人类正在从物质主义阶段向后物质主义阶段过渡，某些后物质主义的基本理念已经在此物质主义阶段萌芽。顾名思义，物质主义阶段的主题是物质层面的利益组合，比如，国家的存亡，经济的得失。解决生存问题的现实主义和解决发展问题的自由主义交互盛行，这是物质主义阶段的必然现象。“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弊端，如果任其肆意发展，不仅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宁，而且会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1]但是，“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时是对‘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强调’，有时是对‘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强调’，有时是对‘归属感、自我表现、智力和审美满意度的强调’”，^[2]总之是对自我身份独特性的强调，这也是建构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率先通过工业革命开启物质主义时代的西方国家也率先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开始关注环境、女权、移民福利等软政治问题，因此在经济竞争中自然不敌尚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后起国家。^[3]但是，随着后起国家在物质层面也已迎头赶上，尤其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也已实现物质丰富，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精神需求便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对物质需求的反超之势。当物质层面的生存和发展至少不再构成主要大国的首要问题，人类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势必浮出水面。比如，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不仅仅强调其利益优先，更是要强调美国自由主义国家领袖的独特身份，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并非“自由主义是错误的”，而是“只有美国坚守自由主义是错误的”，因此，其所谓“公平和可持续的贸易”大有呼吁所有国家按照美国规则行事之意。^[4]英国脱欧公投的举动体现了英国对其“例外”身份的执着，^[5]虽然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对经济未必有益，却对其找到存在意义颇具抚慰之效。俄罗斯愈发热衷于在国际场合强调其“欧亚国

[1] 王静、张心怡、任凤芹、崔涌泉：“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缓解干预策略”，《心理学探析》，2019年第1期，第6页。

[2] 丛日云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3] 高力克：“全球化中的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54页。

[4] Pierre, Lemieux, “Putting 97 Million Household through the Wringer”, *Regulation*, Vol. 41, No. 1, 2018, pp. 8-11.

[5] 曹晓云：“试论英国脱欧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48页。

家”的独特属性和作用，^[1]尽管欧亚身份有可能使其两面受敌。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巨大的经济成功也使中国对自主探索出的新型大国崛起之路信心益坚。可见世界主要大国的注意力都已经或有意或无意地从“生存发展”向“身份意义”侧重。由于“人类”的这一集体身份并未超越主权身份成为主流，因此，各个人类族群获得意义的内容和途径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从某个角度讲，独特性需要差异感，差异本身对于各个族群认知本族群身份大有裨益，但是在客观上却必将造成新观念、新规则、新机制的匮乏，以致在全球治理赤字之下，造成了一种物质主义权力政治回归的假象。

但是其次，战争早已不再是建立秩序的出路。除了前文所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之外，战争过时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抛弃物质主义阶段的首要标志便是各族群普遍将物质层次的杀戮视为最难以接受的荒谬之事。正如即使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可以接受用火炮杀死同类，却也无法将原始人互食同类，以活人祭祀神灵等行为视作正常，出生于21世纪的人也势必将越来越难以想象采用肉体毁灭的方式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人类每渡过一个发展阶段，通常会将上一阶段的暴虐行为视同人类身份之外的禽兽之举。因此，大国之间各自身份回归有之，战争无法轻启亦有之，虽然尴尬，却属进步。

然而最后，后物质主义阶段究竟为何物却未明朗，人类在真正踏入后物质主义大门之前，没有放慢发展速度的理由。正如早已拥有互联网思维的人类仍然被原始人的肉体所束缚，虽然人类在集体精神上渐臻后物质主义状态，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仍然被物质主义所主导，物质主义的座右铭只有一个词“发展”。一个贫家挑水女孩无法想象公主的生活，甚至会想象“公主的扁担大概是黄金所铸”，其想象虽然荒谬，却不失为基于其经验事实进行的合理推测；囿于物质主义路径依赖以及广大仍然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类站在后物质主义的门槛上，迟迟未能迈出进入后物质主义殿堂的坚实一步，但人类的精神却已经如贫家挑水女孩一般，在物质主义的先验条件下对后物质主义阶段的具体生活展开了超验推理。由于人类情感通常摆荡于无聊和痛苦之间，^[2]人们对于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同时产生了向往和恐惧两种情感。向往者没有发现另一条通往后物质主义的道路，却急于摆脱物质主义的“无聊”，因此只能主张在

[1][俄]马克·巴莘著，张红译：“地理的不确定性：关于俄罗斯、欧洲和亚洲的四个论题”，《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第61页。

[2][德]阿·叔本华著，韦启昌译：《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物质主义上加速前进。尽管他们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阐明“物质主义的尽头必然有一个美好的后物质主义状态在等待着人类”，也没有证明“即使有一个天堂般的后物质主义时代存在，人类却必须经由物质主义的极致状态才能抵达”，但现实之并使他们坚持认为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由发展解决，对付效率的最佳武器就是效率本身。然而，恐惧者对于“无聊”的抵抗能力明显更强，他们着重警惕后物质主义时代出现更大“痛苦”。然而，同样由于缺少通往后物质主义的路径信息，他们既不能证明“物质主义危机必然先于后物质主义时代来临”，也无法证明“后物质主义意味着人类的危机和灭亡”，甚至无法证明“人类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也会最终陷入无聊”。但是，恐惧者的明智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未知保持着敬畏和谨慎的态度，遏制着“新必胜旧”的直觉冲动，把“向内寻找”“控制好奇”等格言奉为圭臬。在向往者与恐惧者的对立之中，向往者明显占据上风，因为在“容易的事”与“正确的事”之间，人类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遑论后者未必正确。

综上所述，三种变局似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后物质主义的到来使人类各族群勇于回归本族群的独特性，却难以用入不敷出的战争方式强行统一身份（变局二）；因此人类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并由此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偏向效率最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进而导致智能化趋势愈发强大（变局三）；由此导致合作应对新危机的必要性越来越大，于是故事弱化背景下的合作难题越来越大（变局一）。

最后不得不严肃地强调一点，“不劳而获”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理想，这决定了类似的“两难”变局将会更频繁、更快速的出现。即使最强调用财富和工作荣耀上帝的加尔文教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希望重新和神建立连接，而建立连接的目的，是为了回到人类祖先偷食苹果之前的天堂一般的生活。科学和宗教在“不劳而获”的理想上不谋而合，因为它们本是这种理想激发出的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只要“不劳而获”仍然神圣，“选择捷径”便会牢牢控制着人类的潜意识。捷径一方面会更快地实现眼前目标，但另一方面却通常会为更长远的生活制造困难，这种困难的具体表现便是“两难”境地。直接破坏性开发自然资源是捷径，但却使人类陷入“生存”和“治理”的两难；用战争手段强迫其他族群屈服是捷径，但却使本族群陷入“和平”和“镇压”的两难……在后物质主义思潮下回归本族群故事是捷径，但却会陷入“合作”和“战争”的两难；在物质主义路径依赖下继续发展智能科技是捷径，但却会陷入“危机”和“停滞”的两难。

“由于所遵循的轨道并不是单线的，因此，向一个目标的运行有可能使之离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1]人类走的捷径越多，“两难”就会越多、越大、越快进入视野。

中国在“大变局”中的自处之道

“中国将往何处去？”这是每当中国行至历史拐点之处必须回答的古老问题。历史上每到一处重要拐点，中国的答案无外乎“引入新因素”或“建立新制度”，但这些答案被提出的背景是物质主义盛行于世。当中国进入一个以合作空前必要却也空前困难、战争乏利可图且人外智能崛起为特征的、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的新体系，向外部物质世界或者物质组织方式寻找答案已非正确方向。中国要在未来的后物质主义阶段领风气之先，立不败之地，首要任务便是超脱于旧的极端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理解但不自缚于地缘政治、军事投射、经济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主题，重点关注国际社会的最前沿问题与最深刻变化，并落实于内向提升国家修养。

首先，国力愈强，宜姿态愈卑。物质主义阶段的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非如此不足以在物质世界中生存和发展；更兼“所有谈论我自己的东西——尤其是我从‘我’一角度来谈论自己的东西——都将自己指认为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东西的个体”。^[2]因此，以自我为中心是物质主义犹存的、全球性故事弱化的世界的必然产物。如果联想到无数被忽视或被闲置的全球性未解难题，自我中心主义几可沦为万恶之源。中国作为有着“上善若水”文化传统的崛起大国，从物质力量到文化基因都具备领衔建构新体系文化的条件，而开此文化先河的前提是中国要成为“同理心”最强的新型大国。鉴于自我中心主义在全球性故事弱化的环境中强势回归，越强调本国反而越丧失本国的独特性，沦为以“强调本国独特性”为特征的平庸国家，为避免陷入“越强调越平庸，越平庸越强调”的怪圈，中国宜在所有对外交往中努力使其他国家能够切身感受到其本国的权威尊严、文化特质、自主权利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充分认可。具体表现为，少

[1][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2][德]恩斯特·图根的哈特著，郑辟瑞译：《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一项人类学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而精准地表达自我，大而系统地认可他国。如此行事风格不应是策略性的惺惺作态，而应是慎重审视本国世界观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举止。如果中国能够跳出“我执”的窠臼，使所有“他者”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得到了承认，中国将自然而然成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新文化引领者。越是所有国家都沉迷于自我神话不能自拔之时，中国越应保持清醒，从心理上超脱其外，牢记来自老子的教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指低洼之处），故几于道。”^[1]

其次，外事愈多，宜内务愈勤。在中国于所有维度日益接近世界中心之际，中国务须接受正态分布型外来冲击：极其反感与极其欢喜中国崛起的国家必属少数，绝大部分国家都将处于“不悲不喜”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国家注定复杂多变，却又不可回避，中国有两种从国际中间力量中获得崛起国合法地位的途径：追求和吸引。所谓“追求”，即主动调动各种国内资源，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策得辄行，智计频出地使用对外手段寻求他国从心理和政策上接受中国崛起。此途径可行性甚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战争手段已经过时，“战”与“和”两种工具已失其一，在缺少强制力手段的情况下，让利方式不可持久，说教方式难以服人。因此，“追求”之法或难以成功，或即使成功，终将失败。而所谓“吸引”，即精修内政，以国家的全方位强大与公民的全方位幸福获得他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认可乃至效法。尤其要对公民幸福进行更高水准的认知——不仅要提升公民生活水平至物质主义阶段的较高水准，而且要为公民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创造条件。当战争不再可行，中国要获得深刻而持久的心理优势与有利环境，便不能沉溺于捷径思维，而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尤其要顺应公民的后物质主义精神需求，进一步释放社会潜力，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实现“X个后现代化”，以求社会力量可以在未来后物质主义时代占据先机。为切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的座右铭应是“不可高估决定性时刻，不可低估寻常微小的改进”。

最后，前途愈晦，宜担当愈早。尽管后物质主义时代仅仅出现朦胧曙光，但是其大势不可逆转。同时，智能科技将发展至何种程度，其与后物质主义结合将如何重塑社会形态，尚未可知。能否合理认知和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超出“提升效率”的本质部分是决定中国能否占据未来发展先机与规则制定权的关键。中国

[1] 《老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20页。

应加大对“未来学”的投入，尝试从更高维度解决眼下的地缘政治、产业结构、人口失衡等问题，加紧研究与科技革命相关的伦理、制度和法律议题。比如，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再次翻倍，有可能为社会治理和情感伦理造成哪些冲击？如果信息超载不可避免，应如何减轻诉讼超载和法律爆炸带来的重负？^[1]如果智能机器果真出现主观能动性，人类应如何实现安全合作并进行危机管理？如果人类在技术爆炸中突然具备探索宇宙深处的能力，是否应该迈出祸福难测的一步？这些问题貌似杞人忧天，但在一个几何级数演变的世界，它们很可能是未来短短数十年乃至数十年便会出现的棘手问题。等待不确定性全都自然消失注定是无望之举，等待条件全都具备才开始行动则必将太迟。虽然解决高深的问题必然会带来更高深的问题，做出艰难的选择也必然引发更艰难的选择，但是，“随着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适应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同时，宇宙也越发神秘妖娆。作为一个活生生、有意识、具有智能和创造性的微小粒子生活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远远要比生活在以扁平狭窄的地球为中心的小宇宙上要精彩得多”。^[2]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从时间维度上讲，当为人类瞭望未来。

结 语


“追求生命的确定性”是人类最深刻的生存本能之一，但是，无论是《周易》所述之“变易”，佛陀所言之“无常”，量子物理所论之“不确定”，都无情地揭示了“变化”之无可逃避。一切终将腐朽，一切终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心灵上的毫无出路感，不再相信存在的意义，以及不可能实现我们心中的精神渴求，等等，是造成痛苦的最重要原因”。^[3]但是，是什么使人类“毫无出路”，甚至“不再相信存在的意义”呢？是变化。变化向坏还是向好？其答案取决于人力介入自然规律的时机、方向和程度。在客观层面，事物的变化发展难免经历“兴起”“壮盛”“衰败”“灭亡”的过程。理想状态下，人类若要生生不息，千秋万岁，便须在事物的“灭亡”阶段到来之前推动“衰败”之旧事物变化成为另一种“兴起”之新事物；其方向并非回到旧事物“壮盛”之时，而应是面

[1] 鲁楠：“科技革命与法律演化的两个面相”，《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1期，第72页。

[2] [美]杰夫·霍金斯、桑德拉·布拉克斯莉著，贺俊杰、李若子、杨倩译：《人工智能的未来》，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3] [德]赖因哈德·劳特著，沈真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向一种与旧事物无关的崭新事物；其推动程度尤须循序渐进，不得揠苗助长。所谓“大变局”便是人力与自然规律交合处的剧烈碰撞，人力介入的时机、方向、程度一着不慎，便有倾覆之祸。遍观人类所有学问，无一不是在为“大变局”做准备。学问家们如履薄冰地观察着他们各自熟悉的知识领域，时刻准备宣布“大变局”的到来，并随即介入历史。但是，以人类有限的知识和无限的欲望而论，谁也无法在显意识中第一时间精确捕捉到“衰败”阶段的到来，遑论以有效手段化腐朽为神奇。然而人类生机勃勃、履险如夷却是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弥补了应对“大变局”的理想状态与人类认知滞后之间的鸿沟？这是有待后来学者继续探究的积极线索。

在洞悉当下“大变局”的全貌取得相对令人满意的进展之前，人类至少可以坚守三条底线：第一，不再以全面战争解决冲突或者发泄情绪；第二，对未知保持敬畏，不断内向责问“我们是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错误的？我们信念和行为的真正原因是否被掩盖”？^[1]第三，鼓励所有族群参与建构新故事或者其他有助于凸显人类共同身份的行为。而无论人类最终决定推动或阻碍变局的进一步演变，都不应忘记德尔菲神庙的训诫，“Commitment brings misfortune”（试图操控未来者必将痛苦万分）。

（责任编辑：崔秀梅）

[1]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77.